

不许犯我

黎萨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 许 犯 我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

陈尧光 柏 群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José Rizal
NOLI ME TANGERE

根据马尼拉菲律宾教育出版公司 1912 年版
英译本 “The Social Cancer” 译出

不 许 犯 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1}{8}$ 插页 1

197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483

定价 1.75 元

前 言

何塞·黎萨尔是菲律宾近代著名作家。他于1861年6月19日诞生在菲律宾内湖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黎萨尔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菲律宾人民前赴后继、奋起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时代。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对他的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他还不满十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受诬被捕，被关在监狱里两年多，受尽了折磨和屈辱。黎萨尔很爱他的母亲，从小跟母亲学习诗歌和艺术，因此，这件事给了他很大打击，加上周围菲律宾人民受压迫的悲惨情景，使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有了初步的认识。

1872年，菲律宾甲美地的工人、兵士和农民举行起义，提出“打倒西班牙”的口号。这次起义遭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殖民当局还趁机杀害了极力主张改良和教会菲律宾化的三位菲律宾神甫，并流放了一批菲律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这次起义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显示了菲律宾人民民族觉悟的高涨，对黎萨尔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72年，黎萨尔进入马尼拉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读

书，1876年毕业。青年时期的黎萨尔，由于受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推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十八岁时，发表了著名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热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第二年，又在一个讽刺剧里，嘲笑了西班牙教士的伪善，揭露了行政官员的卑鄙和残暴，因而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

1882年，他不得不离开菲律宾，出走欧洲。他先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学医学、文学和哲学；1885年，赴巴黎专攻眼科学；1886年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历史和心理学；同时，利用他所掌握的多种语文，研究了欧洲古典文学。大学毕业后，他又游历了欧洲各国。这期间，他虽然远离祖国，但仍时刻关注着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和民族的命运。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起，创办刊物，掀起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宣传运动”，抨击西班牙殖民者，揭露修道会的种种罪行，提出改革殖民制度、民族平等、驱逐西班牙教士等要求，同时宣传菲律宾民族自豪感。黎萨尔为了进一步宣传他的主张，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1887年在柏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用西班牙文写作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并设法将一部分书偷运回国。1887年七月他回到国内，但为殖民当局所不容，不到半年，又经由日本和美国重返欧洲。1892年，在比利时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起义者》。

1892年6月，黎萨尔经香港回到了菲律宾。同年七月，他创立“菲律宾联盟”，幻想通过和平和合法途径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数日后，即被殖民当局逮捕，流

放到棉兰老岛达比丹要塞达四年之久。在这里，他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在教育、卫生、供水、医疗等方面为当地人民服务，教导农民应用现代农业技术，自己也从事一些科研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波尼法秀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战争。西班牙殖民者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民，甚至与这次起义无关的黎萨尔，也被军事法庭以“组织非法团体”和“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造反”等罪名，判处死刑。1896年12月30日，他在马尼拉被杀害，时年三十五岁。

临刑前，黎萨尔写了一首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这首诗充满着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

何塞·黎萨尔对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和菲律宾近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就是他的两部分内容连续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这两部小说描写了菲律宾人民和西班牙殖民者的民族矛盾和斗争，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期殖民统治下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了菲律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探索了菲律宾民族运动的方向，对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很重要的启蒙和推动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早年在研究和介绍被压迫和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时候，就曾多次提到过黎萨尔的名字。1918年，鲁迅在《随感录》这篇短文中，说到他“总最爱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

其中“最注意的是芬兰、斐律宾、越南的事”，然而“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即黎萨尔——引者）的小说”。后来在《杂忆》一文中，鲁迅又一次提起这位“飞猎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即黎萨尔——引者）”。鲁迅在黎萨尔的作品里，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复仇和反抗的”叫喊。鲁迅准确地点出了这两部作品的重大主题。

菲律宾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被西班牙殖民者强行占领，沦为殖民地达三百多年。列宁指出：“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夺取来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因此，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进行侵略和掠夺、杀戮和奴役的血腥历史。菲律宾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黎萨尔在他的两部小说中，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黎萨尔以犀利的笔锋，撕下了那些专横跋扈的总督、荒淫无耻的神甫、贪赃枉法的官员、仗势欺人的国民警卫队长等等殖民统治者的一切假面具，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在作者笔下，整个殖民统治机构就是由一群利欲熏心、贪婪腐化、穷凶极恶的家伙组成的。他们用殖民主义的“文明”——火枪和天主教——征服当地居民，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在经济上巧取豪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在政治上为非作歹，残酷地压迫殖民地人民。殖民地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殖民者的腰包。

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反动的天主教修道会。它是殖民者掩盖自己的暴行、麻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天主教修道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实际上控制了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它还霸占了大片土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地主。恩格斯说过：由于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黎萨尔把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锋芒直指天主教修道会及其神权统治，充分暴露天主教会的黑暗和反动，尽情嘲笑教士们的顽固、伪善和贪婪。他在小说中向人们表明，天主教会并不是什么圣洁高尚的东西，大大小小的教堂就是罪恶的发源地，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甫，打着“积德行善”的幌子，实际上配合着监狱、特务、国民警卫队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这些自命为“天主的代表”的神职人员，以最高领主兼神权统治者的身份，管制人们的思想，掌握政府的大权，实行最残暴的神权统治，是菲律宾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在西班牙残酷的殖民统治下，劳苦人民大众遭受着沉重的苦难。不断的土地兼并，使多少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黑暗的神权统治又使多少人随意遭受逮捕、监禁、拷打、流放和杀害。但是，菲律宾人民是有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传统的，人民不堪长期忍受压迫，人民要起来造反。这两部小说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民受奴役、压迫、剥削、欺骗、凌辱的悲惨生活图景，反映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不许犯我》中埃利亚斯的血泪家史和《起义者》中塔勒斯一家的不幸遭遇，就是苦难深重的菲律宾人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

下,从受奴役到觉醒、起来战斗的真实写照。菲律宾好象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成熟。

黎萨尔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于菲律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进行了探索。两部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是和这种探索有关的。十九世纪末期,菲律宾民族正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东方各国之前,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曾经进行过种种艰难曲折的试探。黎萨尔正是怀着为祖国和民族寻求出路的可贵热情写作这两部书的。他在《不许犯我》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包含着一些至今谁也没有讲过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这些问题都非常敏感,所以任何人也不敢轻易去接触。我想做在我之前谁也不愿意去做的事,我敢于回答几百年来对我们和我们祖国的诽谤。我写了社会情况,写了生活,写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不平和悲苦。我揭露了伪善,这种伪善在宗教的面具下,在我们中间传播,把我们贬低、降到牲畜的地位。”《不许犯我》及其续篇《起义者》的思想意义,就在于它严肃地提出了当时菲律宾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尖锐问题,如反殖斗争、民族独立、祖国前途等等,并且试图给予回答。

探索民族独立、反殖斗争道路的主题,主要地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伊瓦腊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在伊瓦腊这个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上,概括地体现了十九

世纪末菲律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幻想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

伊瓦腊的探索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前一阶段，是从他自欧洲留学归来，满怀爱国热情，想要在祖国做一番改革社会的“好事”开始的。这时期，他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天主教会、祖国前途，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西班牙殖民者是“真为菲律宾人民的好处着想的”，天主教会把菲律宾人民“从异端邪说中拯救出来”，菲律宾“国家的幸福，是建筑在与西班牙联盟的基础上”。他反对变革殖民统治的现实，主张通过他在西班牙议会中的朋友来为民请命，等待殖民当局自动实行改革。为了维护和促进菲律宾与西班牙宗主国之间的“联盟”，他回国后着手干起来的第一件“好事”就是要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想要通过开发民智来达到这个目的。很明显，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西班牙宗主国的“亲善”和“仁慈”上面，幻想在不触动殖民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某些社会改良，来缓和菲律宾人民同殖民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事实证明，这种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伊瓦腊“教育救国”的计划，在被压迫民族与殖民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碰得粉碎。学校刚刚破土动工，等待着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诽谤、打击和陷害。他的名誉被破坏，理想被践踏，爱情被玷污，人身被监禁，甚至性命都保不住。残酷的现实和亲身受迫害的经历，使伊瓦腊睁开了眼睛，看见了社会的“毒瘤”，逐渐认清了殖民统治黑暗、罪恶

的本质。觉醒过来的伊瓦腊愤怒地控诉道：“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向他们伸出双手，向他们要求友爱，想把他们当作兄弟，可是他们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侮辱，嘲笑，甚至不拿我们当人！世界上已经没有天主，没有希望，没有人性，什么都没有了！强权就是公理！”他得出结论说：“现在，我已经看见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这是伊瓦腊对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一次清算和否定，是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和飞跃。

伊瓦腊探索的后一个阶段，是在他逃脱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十三年后，从美洲回来，改名席蒙，以珠宝商和总督顾问的身份，在祖国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和斗争经验都有了提高，对改良主义的危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菲律宾的知识分子想要用玫瑰花把祖国和西班牙联在一起，实际上是给祖国套上枷锁；他揭穿有人鼓吹菲律宾可以和西班牙合作，那只是欺骗人民，使他们在暴君面前俯首帖耳，任人宰割；他指出参加西班牙议会没有用处，要“以暴抗暴，以牙还牙”，不要争取做西班牙的一个省，而要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他采取“煽动和鼓励贪婪”、“怂恿罪恶”、“制造灾难”的办法，竭力鼓动总督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从内部加速殖民统治集团的溃烂，以迫使人民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但是，由于伊瓦腊的阶级地位、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决定了他的斗争只能采取孤军奋斗的方式和恐怖冒险的手段。他以为仅仅凭借个人的

力量就足以和反动统治的强暴势力抗衡并取得胜利，所以他不是深入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坚持长期的斗争，去推翻殖民统治；而是相信“我一发信号，革命就爆发了”，只要一颗炸弹把敌人“炸成一堆垃圾”，就可以“把这个国家打扫干净，消灭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在斗争中孑然一身，单枪匹马，十分孤立，在他密谋策划的三次暴动中，绝大部分群众“全是赤手空拳，也没有组织起来”，这就注定了三次行动计划都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和某些个人事故、偶然因素而接连失败了。他自己最后也在逃避殖民者的追捕中，在一个荒凉的海滨上服毒自杀了。

伊瓦腊的探索和他的悲剧，反映了软弱的菲律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理想与殖民地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探索变革社会的道路与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正是黎萨尔本人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

1872年菲律宾甲美地起义，虽然被殖民当局镇压下去了，但这次起义对当时的民族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以黎萨尔为代表的侨居国外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宣传运动”，就是这次起义的一个结果。黎萨尔的这两部小说也是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写成的。黎萨尔曾在1889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评价这次起义时说：“没有1872年，现在就不会有普拉里杰尔，不会有哈恩那，不会有桑西埃科^①，就不会有居住在欧洲的勇敢而高贵的菲律宾

① 以上三人都是当时菲律宾爱国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侨民；没有 1872 年，黎萨尔就会是一名耶稣会会员，而且会写出完全相反的东西，而不是《不许犯我》。”而后来的《起义者》也是献给 1872 年起义中牺牲的三位菲律宾神甫的。可是由于黎萨尔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在国外又和一批鼓吹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包括西班牙国内主张对殖民地实行改革的知识分子和神甫）在一起，就使他没有从积极的方面接受历史教训，看不到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而只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认为工人，特别是广大农民，只有在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下，才能变成改造社会的力量。所以，在 1887 年，黎萨尔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虽然认识到“和平斗争永远只是梦想”，但还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想和西班牙分离，只要求给我们更多的关心，保证我们受到教育，给我们优秀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一个或两个代表，使得我们能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命运。如果西班牙的作法更明智些，它就能赢得菲律宾人的尊敬”。

黎萨尔在写作《起义者》的几年里，思想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的。当时，菲律宾国内的情况日益恶化。殖民者残酷迫害人民，教会胡作非为，令人发指，常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遭到洗劫，焚烧，黎萨尔一家也被逐出家门。受害者露宿街头，教会甚至禁止任何人收留他们。现实阶级斗争的发展，把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几年，他在和朋友的通讯中，有不少呼吁人民进行斗争的语言：

“我不愿参加阴谋活动，……然而，如果政府逼着我们这样做，……我也会变成暴力手段的拥护者。”（1887 年）

“一个人被枪杀，被绞死，接着站起来的将是二十个人、三十个人，继续他的事业，重新迎着死亡前进。”(1888年)

“让全世界、让我们的敌人看看，在教士们的威胁面前，我们是不会发抖的，我们不会受他们的诺言的诱惑。”(1889年)

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却是黎萨尔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在他看来，那样，既会损害西班牙，也要使菲律宾人民遭受灾难。“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不需要血，我们没有憎恨，我们只是在一切办法已经用尽、不斗争就得死的情况下才诉诸暴力。”(1889年)因此，当他1891年写完《起义者》以后，在国内形势继续恶化、许多人因为读了他的书而遭监禁的情况下，他带着绝望的情绪，回到了祖国，幻想以牺牲自己来拯救因为他而受迫害的人。黎萨尔这个时期的情绪，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榜样将证明：我所一贯宣传的东西是真诚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将死去，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想到，随着我的死，你们所有的灾难就将结束。”(1892年，在香港)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后来，当国内的革命者计划发动武装起义，派代表到他被囚禁的棉兰老岛去请他出来作领袖的时候，他竟然拒绝了。而且后来，还要求到镇压古巴革命的西班牙军队去当军医。但这时国内1896年革命爆发了，殖民当局害怕他的影响，还是把他从途中追回处死了。

黎萨尔这种世界观上的矛盾，即看到武装起义的必然到来和他极力要想避免武装起义的矛盾，改良主义和武装斗争的矛盾，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这两部作品，特别是第

二部作品里。为了迫使西班牙殖民当局进行改革，他使自己第二部作品的主人公进行了“暴力手段”的实验，进行了一系列“以暴抗暴，以牙还牙”的活动，可是最后还是被自己否定了，而且还请出了一位开明的神甫，重述了一遍他的改良主义的说教。这就使这部揭露和抨击殖民主义的小说大为减色。还应该指出，书中对华侨的描写，有些地方流露出讽刺和污辱性的色彩。这也是应该批判的。

尽管如此，黎萨尔的两部小说，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还是不能低估的。他的《不许犯我》被偷运到国内之后，不仅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甚至连边远地区的农民也去找识字的人，把小说的一些章节译成他加禄语，讲给他们听。因此，在殖民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慌。黎萨尔的小说被宣布为“反宗教”、“反国家”、“有害的”，禁止在菲律宾出版和发行。读他的书的人，一经查出，即遭监禁。可是小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民族境遇，激起了对殖民者的无比义愤。小说对后来以波尼法秀为首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甚至黎萨尔的死也变成了革命的号召，使许多人参加了起义军。由于黎萨尔对菲律宾民族运动的贡献，菲律宾独立后，黎萨尔即被当作民族英雄，受到菲律宾人民的敬仰。他的书也被定为学校的必读书。

对我国读者来说，黎萨尔的两部小说也多方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殖民地社会形象的历史图画，是我们了解菲律宾人民斗争历史的一部好教材。马克思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

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部作品真实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可以了解什么是殖民地社会，什么是殖民主义。而且还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这就是：要推翻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任何改良主义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厦 门 工 程 机 械 厂 工 人 评 论 组

厦 门 大 学 中 文 系 外 国 文 学 评 论 组
厦 门 大 学 南 洋 研 究 所

1977. 5.

目 次

第 一 章	一次盛会	1
第 二 章	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	19
第 三 章	晚餐	23
第 四 章	异教徒和叛乱分子	31
第 五 章	夜里一颗星	40
第 六 章	甲必丹蒂亚格	43
第 七 章	屋顶花园之歌	58
第 八 章	回忆	69
第 九 章	地方上的事	76
第 十 章	圣地亚哥镇	83
第十一章	统治者	87
第十二章	万圣节	94
第十三章	风暴的征兆	100
第十四章	塔席奥：疯子还是哲人	105
第十五章	圣器管理员	117
第十六章	茜莎	123
第十七章	巴西里奥	130